

發翁藏書題跋

李國慶 編著 周景良 校定

紫禁城出版社



宋鶴林予氏刊春秋經傳集解為海內孤本世所罕見
不僅紙墨瑩潔光彩奪人亦可貴重丙寅歲余始見
四卷於北京翰文齋卷二卷十七卷十八卷二十一時和從臨清
徐氏散出議價未成卒為德化李氏所得時舍之
不能忘而頃歲袁氏所藏一卷卷六則輒轉歸蘆江劉
氏未之見也乙亥夏楊君敬夫忽以殘本二十三卷見示為
之驚喜過望以重值收之此書楊氏先德光緒甲午年得
於北京當時已逸七卷製續時乃預為之地蓋以期他日之
湊合也余於是亟從李氏購得四卷其價值倍於楊氏
十一月遊北京偶過文祿堂見第十四卷影片詢知原書藏
石氏因挽文祿堂主人王晉書圖之復眺書伯兄上海乞
商劉晦之丈讓所藏第廿六卷丙子正月王晉書以石氏
書至已既易舊裝而值更高於李氏若劉氏之一卷則秘
為鴻寶堅不肯讓數年來屢以為請皆拒而不允其第十
卷更無從踪跡噫此書或將不能終完即余前數年收宋
岳氏本春秋左氏傳亦偶乞配合凡歷三年其第一卷則
失之文蔚且闕燬於壬申上海南北之變今劉氏書散佚
過半創合殊遲之願更不可期得失聚散固有定數非人
力所能強第衷心耿耿終不能不為此書深懷惜耳
壬申四月初一日發翁記於自莊羅地 壬午歲書于申



責任編輯：章宏偉
裝幀設計：姜尋工作室

ISBN 978-7-80047-625-9



9 787800 476259 >

定價：800.00圓（全二冊）

J292.28
131
:2

28

131

2



張翁藏書跋題

八
年譜
V
(增訂本)

李國慶 編著
周景良 校定

紫禁城出版社

序

弢翁哲嗣珏良先生在《我父親和書》（載《文獻》一九八四年二十一輯）一文中說：我父親從十六歲住揚州時起就受家庭的影響開始買書。筆者在編年譜時發現了一條資料，可以為這句話加上一個注腳。清光緒間湖南思賢書局刻本《水雲樓詞》書後載有「光緒卅二年冬月周暹讀」一行墨筆題記。這行題記為弢翁自題。書中鈐有二印：一是「寐景詞人」白文方印，一是「建德周三」朱文方印。二印並是弢翁藏書印。當時弢翁恰好十六歲，由此開始他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藏書生涯。

縱觀弢翁藏書，大致可以劃分為前、後兩個時期。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至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為前期，側重於訪書、藏書、鑒別、校書及刻書方面。其事可察，其例不可悉舉。民國六年（一九一七）收得宋版《寒山子詩》、《諸史提要》及黃丕烈校元本《韓詩外傳》，是收藏善本之始。其後，楊氏海源閣五十餘種散出秘笈黃氏士禮居四十餘種題識之書，以及宋余仁仲萬卷堂本《禮記》、宋鶴林于氏刊本《春秋經傳集解》等一批秘笈陸續成為自莊嚴堪插架之物。在此期間弢翁與徐乃昌、葉景葵、徐鴻寶、袁同禮、張允亮、趙萬里及傅增湘等業內名家過從甚密，又與陳師曾、唐蘭、方爾謙、袁克文、勞健、顧廷龍等各界人士有過交往，以代收、賞鑒、借閱、贈書及鐫刻藏印為樂事。王子霖、王晉卿、魏子敏等書友往來不絕於門。今所見弢翁古書題識一百四十餘篇，及與人往來信札二百餘通，記述了這段史實，彌足珍貴。弢翁訪書之暇，展卷誦習，遍校群書，今見校本五十餘部，並曾有擬校《四部叢刊》之議。校書文字皆字畫端謹，朱墨鮮妍，頗具義門風格（傅增湘

語)。並遴選精校之書，付諸剞劂。民國七年（一九一八）校刻唐人寫本《佛說阿彌陀經》，是張翁刻書之始；其後《寒山子詩》、《魚玄機詩》及《張翁續得印一集》等十餘種書，或雕刻、或影印、或拓印，相繼行世。所印之書，校勘精審，楮墨俱佳，裝幀考究，皆成新版善本。人或收藏一部，無不視為難得，什襲珍之。

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至一九八三年張翁逝世前一年，為後期，主要從事捐書活動，兼及訪求活字本古籍。張翁早在四十年代初期即寫下有關自己收藏善本古籍的至囑，認為自己所藏實天下公物，將來應捐贈國家。新中國成立後開始有計劃地向國家捐書。從一九四九年向國家捐贈宋版孤本《經典釋文》卷七開始，到五十年代初期分別向北京圖書館、天津圖書館大規模捐獻宋、元、明善本及清版古籍，以至七十年代初向天津市文化局捐贈千餘種文物和近萬冊古籍止，終將畢生之聚盡數舉獻國家，捐贈規模之大，數量之多，價值之高，世人尤歎為難能。捐書期間，仍積習難改（張翁自語），不忘訪書。此時昔日所謂善本已不可多得，於是另闢蹊徑，搜集活字印本。訪求活字本始於六十年代初，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忽發收集清代活字本之興（見《張翁日記》），認為此為前人所忽視者（見一九六二年家書）。不期即有收穫，收到銅活字本兩種、泥活字本兩種，皆罕見之品（見一九六三年家書）。經過數年努力，訪得各類活字本古籍四百多種，並於七十年代初舉贈天津圖書館，成為該館一個特色之藏（詳《天津圖書館藏活字本書目》）。由此足見張翁慧眼獨具，實與恒人異趣。

張翁於經營實業和從政之暇，獨嗜收藏古書文物，並以經營實業所得資財作為後盾，憑藉自己淵博學識，訪求天下善本古籍和珍稀文物，以藏品之精且富而崛起北方，與木樨軒、雙鑒樓鼎足而立，駸駸且駕而上之（傅增湘語）。所藏宋槧元刊、明清佳刻及鈔校善本，琳琅滿架，其中不乏海內孤帙、銘心絕品者（詳《自莊嚴堪善本書目》）；而所儲敦煌遺經、古代璽印、名人字畫及舊墨泉布等珍稀文物，林林總總，煥然生輝（詳《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

獻》及《周叔弢先生捐獻璽印選》等）。藏品之數量當以萬計，而藏品之價值則無法估量。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弢翁終於實現了自己多年的夙願，化私藏為公有，將藏品悉數捐獻國家，成為國家圖書館、藝術博物館中鎮館之寶。弢翁對國家貢獻至大，向為世人稱頌，受到政府褒揚。為一代名賢。

清人洪亮吉在《北江詩話》中將藏書家分列數等：考訂家、校讎家、收藏家、賞鑒家、掠販家。謝國楨先生稱弢翁之於學，精通目錄，於校讎、賞鑒兼而長之。晚生進而言之：弢翁藏書既精且富，是為收藏家；鑒別既精且確，是為賞鑒家；校書既精且審，是為校讎家；出資刻書，是為出版家；訪書為捐獻，與一般藏家迥異，是為當代藏書大家。

編者供職津圖，有幸典守弢翁遺書，仰慕弢翁懿德，每見弢翁手澤，無不視為珠玉，錄而存之；復得弢翁哲嗣等見貽珍貴資料，依年係事，編成是譜，以期窺視弢翁一生藏書活動之蹤跡。惟聞見未廣，學識淺陋，脫訛難免，深祈方家賜教。爰述弢翁藏書前、後兩期，并於卷端，是為序。

李國慶

二零零零年元月

自莊嚴堪藏書綜述

周珏良

我父親叔弢先生「自莊嚴堪」^①藏書名重海內。自一九八四年父親逝世以來屢見紀念文章，談到各個方面。但一般都注重他所收集的我國善本書籍和捐書情況，他藏書的其他方面和他讀書的情況則極少提及。本文目的在對他平生和書的關係作一較全面的介紹，特別注意人們很少知道的方面。

我父親原籍安徽建德（今東至）縣，生在一個書香的仕宦人家。我祖父名學海，是清朝進士。曾祖父名馥字玉山，曾做過李鴻章的幕僚，任山東巡撫，兩江、兩廣總督，可能因為自己不是科舉出身，所以特別注重重要兒孫讀書。我父親於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生於揚州，幼年在私塾讀書，稍長學過英語。他除在辛亥革命前在南京陸軍小學讀過書外，沒有入過學堂，一生學問全憑自學。他曾向我說他受到我祖父影響從十六歲起就開始買書，自己存的壓歲錢等等都花在那上面。他用張之洞的《書目答問》為指導，買一些研究舊學的書籍。《書目答問》這本書是張之洞於光緒元年任四川學政時為當時的士子寫的，目的是使他們知道應當讀什麼書，什麼書的哪個版本為好，以免暗中摸索找不到途徑。所以這本書雖然是為指導讀書而作，但已有講究版本的意思在內。後來父親無意中得到一部日本田中慶太郎印行的莫友芝著《邵亭知見傳本書目》。莫氏的書以《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為底本，把所見和所知的版本列舉出來並評其優劣，其中包括宋、元、明刻本和舊鈔本很多，這就引起了他對善本書的興趣，

逐漸收集起來，積數十年的精力成為近代我國藏書的一大家，在北方和李盛鐸（木齋）、傅增湘（沅叔）齊名（傅氏《自莊嚴堪勘書圖序》中語）。

我父親開始是為讀書而買書，後來對收藏善本發生了興趣，但為讀而買的書也很多，不但有中文的而且有許多外文的。因為一般談他的藏書多注重善本，所以這方面知道的人很少，本文對這方面要特別介紹一下。

辛亥革命之後，他住在青島，從德國人尉禮賢（後改用衛禮賢，漢學家）學德文和康德哲學。曾和他合譯康德《人心能力論》一書，一九一四年由商務印書館作為《哲學叢書》之一出版。從譯這本書開始，當時計畫再譯一本《康德傳》，然後就一邊學一邊譯他的三大批判書。這個計畫因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尉禮賢離青島回國，沒有實現。我父親於一九一四年也移居天津，並因他叔父華北大實業家周學熙的關係開始經營實業，沒有再研究康德了。但是他還是有許多哲學社會科學書，大多是英文的。他有多卷本的《哲學大辭典》，好多種的哲學史，如威伯、溫得本、厄爾德曼、烏柏威格等人的書都有。哲學家的著作以德國的最多，康德的三個批判書，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和《邏輯》，斯賓諾莎的、叔本華的書都具備。也許是因為嚴譯的影響，他有達爾文的《物類原始》，斯賓塞的著作多種，赫胥黎的《天演論》和穆勒的《群己權界論》的原文本。馬克思的《資本論》英文譯本到抗日戰爭開始前一直擺在他書房書架上。他晚年常常對人說他是「藏書不讀書」，這只不過是謙虛的說法。當然因為他先經營實業，解放後又擔任副市長、全國人大常務委員、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副主席等職，沒有時間從事學術研究，可是他讀書很多，面也很廣，中外都有，古今兼收。他文化修養很高，有學者氣質，同他接觸較深的人都有這種感覺。這裏只舉幾個有關他收藏閱讀外文書的突出例子。第一次戰後德國人施本格勒（一八八零—一九三六）的《西方的沒落》是轟動一時的書，他的藏書中有英譯本。又如葛利斯（一八五九—一九三九）的引起爭論的偉著《性心理研究》

四大冊他也有。節制生育運動的創始人和組織者桑格夫人（一八八三—一九六六，舊譯山額夫人）的書他有原文也有中譯本。英國小說家 D. H. 勞倫斯的引起爭論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九二八）一書，原文的翻印本和譯本於三十年代在我們家裏也已見到了。從他對這些書的興趣可見他思想是十分開明的。他同樣對許多進步書籍也有興趣。記得斯諾的《西行漫記》英文原本就是在三十年代他讀完以後拿給我讀的。解放以後他已六十多歲了，但對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十分認真。他讀過的書都用紅筆劃出重點，還作了幾十本筆記，摘錄書中要點，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九十多歲去世時為止。他有一種深在的對哲理、知識、藝術的非功利的愛好，因之一生雖不乏名利，但對名利十分淡泊，有一種豐富崇高的人生境界。他之所以喜好藏書、讀書而最後又都捐給國家，公諸大眾，是他的這種品格分不開的，這一點特別值得學習。

他的藏書中還有很多的英國文學書籍。他和我說過他曾有一部類似《書目答問》的英文書，文學書就是依照那本書購置的，具體的書名已不可考。他對莎士比亞很有興趣，買了不少他的著作和研究他的工具書、評論著作等，就本世紀二十、三十年代水準而言是頗為完備的。這一批書中包括弗內斯（Horace Howard Furness）父子編纂的巨著《新會校會注會評本莎士比亞全集》（The New variorum Shakespeare）、阿波特（E. A. Abbott）著至今仍不可少的《莎士比亞文法》、《牛津大字典》主編之一恩甯斯（C. T. Onions）編的《莎士比亞辭彙》，當時是標準著作的希得尼·李（Sidney Lee）的《莎士比亞傳》、羅萊（Walter Raleigh）著的《莎士比亞評傳》、巴萊特（John Barlet）的名著《莎士比亞作品索引》。評論則有至今仍不能廢的牛津大學詩學教授勃萊德萊（A. C. Bradley）的《莎翁悲劇論》、哈佛大學教授倍克（George Pierce Baker）的《戲劇家莎士比亞》等等，其中許多現在已經過時，但在當時還是重要著作。此外還有許多如教學用的莎氏全集注釋本。除莎翁著作外，還有斯賓塞（Edmund Spenser）和彌爾

頓的全集和分冊的注釋本，等等。

張之洞在《書目答問》裏很強調「叢書」的重要。我父親大約是受到這個影響，在買英文書上也注重叢書，如《人人書庫》、《家庭大學叢書》以及《司各特書庫》（Scott Library），很多他都買了，文、史、哲方面的書都有。我少時從翻閱這些書中得益不淺。

以上這些書當然他並不全讀。但他只要對某方面的書發生興趣，就往往要買得全一些，不管讀得完讀不完。這恐怕是由他的藏書家性格決定的。買書、藏書對他來講本身就是一種樂趣。

他從青年在揚州時起就愛好攝影，這個興趣一直延續到解放前。他特別注重肖像照，且很有水準，作品曾被選登在國外的攝影雜誌上。這個嗜好也同他購書的興趣結合起來，他不但有許多講照相和講藝術的書，而且有幾種國外雜誌從創刊起到抗日戰爭爆發止。

我父親的藏書中，外文加在一起遠不止通常所說的「萬卷」，在這莽莽的書林中，他最珍愛的是於一九五二年捐給北京圖書館的七一五種二六七一冊宋、元、明刻本和抄本、校本的精品，關於這批書和捐書經過等我已有一篇文章談到^②，但為了使本文具有完整性，其中有些內容本文還要重複一下，那篇文章中沒有談到的本文也要作些補充。

我父親收藏善本書的路子繼承了清朝乾嘉以來季滄葦（振宜）、黃蕘圃（丕烈）等人的傳統。着重宋、元、明刻本和精抄精校本。他於一九一四年在天津以廉價收到清代皇家書庫「天祿琳琅」舊藏的宋本寒山子詩，是他收藏宋、元本的開始，以後若干年中續有所得。二十年代末山東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書，由其後人楊敬夫運到天津之後，他因朋友的介紹認識了楊氏，可以直接從他手中買書，總數達五十多種，大大提高了他藏書的數量和質量。他藏書之中抄本校本極有特色。他曾告訴我，他之喜好抄本是因為抄本多名人手筆，書法可供賞玩。從他的收藏看來，也確是如此，如明成化元年吳寬手抄的《山海經》，書法仿蘇東坡，可稱精品；又

有明嘉靖年間史臣紀抄本《貞白先生陶居文集》，史臣紀是文徵明的學生，小楷端雅。記得我年幼時有一次我父親和傅沅叔等人在天津集會，相約要各自攜帶好書，互相欣賞，我父親就帶了這本書去的。他曾告訴我，這本書雖不是宋版，但比宋版還要可貴。當時他沒有說明理由，現在看來這本書是從宋紹興本抄出，原本已不存，經毛氏汲古閣收藏，有毛晉的私印「汲古主人」印和「宋本」印（毛家用在宋本書上的），加上出自書家之手，有這些特點，確是要比一般宋版書可貴了。他藏書中還有明朝朱存理（性甫）的手稿本《珊瑚木難》，小楷書極精③。因為朱性甫有「人生幾見月當頭」的詩句④，每逢有月當頭時他總要把這部書拿出來翻閱把玩，從中得到莫大樂趣。按毛扆（斧季）《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裏記載有朱氏手書《鐵網珊瑚》一部（此書現藏北京圖書館），十分珍貴，連乾隆南巡時高士奇想買去進貢給皇帝，毛家都沒有答應。這一部《珊瑚木難》的價值是足可與之相比的。

我父親對刻本書善本有個「五好」的標準：

- 一、板刻字體好等於一個人先天體格強健。
- 二、紙墨印刷好等於一個人後天營養得宜。
- 三、題識好如同一個人富有才華。
- 四、收藏圖記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
- 五、裝潢好像一個人的衣冠整齊。

他的藏書中夠「五好」標準的很多，現提出幾種，具體說一下，以闡明這些標準的意義：宋淳熙乙未，陳伯廣在鎮江刻的《新定三禮圖》（一九八五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影印本），小字古雅有致，刻工精整，並有大量木刻插圖，可謂合乎第一條標準。此圖初印精美，看上去如新印書一般，合乎第二條標準，用的紙是淳熙公文紙背面而更增加趣味。書後有錢牧齋（謙益）的跋語，錢是明末清初著名詩人和大藏書家，有他一題，足以達到第三條標準了。這本書收藏

印記尤其出色，其中有明代大收藏家華夏的「真賞齋」印，清初的徐乾學印，乾嘉時大藏書家季振宜（滄葦）藏印和清末四大藏書家（瞿、楊、丁、陸）之一的楊氏海源閣藏印，錢牧齋的跋文下還有他的名號印，這些藏印有一兩種就已可貴，況且如此之多，真如美人借脂粉之助而更加美好了。此書是海源閣的裝潢，也可說是滿足了第五條的要求。

宋本《新序》也是楊氏海源閣舊藏，杭州刻本，字體似歐體，刻工方整，紙印精美，中國版刻圖錄中有其書影（圖版第二二頁）。有錢牧齋題識，黃堯圃藏，曾收入他的百宋一廬賦裏。後有黃跋三則和金錫爵、楊紹和跋，可謂流傳有緒。收藏印記有錢謙益、徐乾學、季振宜、黃堯圃等人的。這部書的裝潢最特殊之處是保留了黃堯圃的楠木書匣，並有舊錦套，孫延題簽。黃家的書匣用木板極薄，但經過二百年的時間仍然堅固不走樣，顏色黑中透紫，頗像紫檀，並有一種深藏的光澤，通體俊雅之至。有這種匣子足為好書生色。

宋本湯漢注《陶靖節先生詩》是清朝乾嘉以來藏書史上有名的書^⑤。這部書字體秀逸，刻工甚精，黃紙初印，每冊首末都用宋金粟山藏經箋上宋人寫經作護頁，書匣是黃堯圃士禮居原物孫延題簽。還有明人董宜陽、項禹揆、清人周春、黃堯圃、汪閔源等藏印。僅有以上的條件本已足夠使這部書成為善本了，但遠不止此，存於書中各家跋語中關於它的流傳的故事才是它如此引人矚目的重要原因。據書中乾隆丁未年顧自修題記，這部書原在藏書家鮑以文處，他不知道湯漢是什麼人（湯漢在宋史儒林傳中有傳）。乾隆辛丑（一七八一）四月他在另一藏書家周春（松藹）處提到，周聽到後連稱好書，並問在哪里，鮑說已賣給張燕昌（芑堂）了，周即從張處借看。張顯然也不知道這本書的好處，只見書面的是宋朝金粟山藏經箋（張著有金粟箋考，當然懂得它的價值），疑心可能是一部好書，所以急於要回去，但周要他出讓，經友人從中說合，經過兩年，到乾隆癸卯（一七八三）五月才由周用明朝葉玄卿「夢筆生花大墨」與張換得。周春得了此書把它和一部宋版禮書放在一起，用了個齋名叫「禮陶室」，非常

珍愛，並有打算以這部書殉葬之說。後來禮書先賣去，齋名改為「寶陶室」；最後于嘉慶戊辰（一八零八）又將陶集賣去，齋名再改為「夢陶室」。黃蕘圃久已聽說這部書，書從周家賣出後他就追蹤購買，先出四十兩銀子但被別人捷足先登，沒買到；後來又通過朋友向買到書的人借來，久經磋商，才以一百兩銀子的價錢買了下來，和他藏的宋本《陶淵明集》放在一起，用了個「陶陶室」的齋名，此事成為藏書史上的一大故實。如上所述，周春得書近於巧取豪奪（先把書壓在手裏再講價錢）所以「秘不示人」（黃蕘圃書跋中語）。恰巧到後來賣書的時候也上了別人的一個小當。據黃跋中記載過程如下：

「並聞諸他估，吳估（東白）往購此書，懷數十番而去。周初不知，但與論直。周索卅二番云：身邊立有，決少悔言。吳即如數與之。竟不能反。去書之日，泣下數行。余雖未面詢諸吳，然聞屢易顏室之名。亦可想見其情矣。」^⑥

這種情節真有點像唐朝的蕭翼替唐太宗騙取《蘭亭序》的故事，因此增加了藏書家對此書的興趣。黃蕘圃收藏此書之後，在道光年間山東聊城的楊以增（海源閣藏書的創始人）聽到「陶陶」的故事，把兩部陶集先後收到海源閣裏。約八十年後，海源閣的書散出，這兩部陶集分散賣出。我父親先買到《陶淵明集》，而湯注陶詩被書商王子霖（名雨）買去，居奇抬價，磋商很長時間。他知道我父親歷來不願好書失群，所以絲毫不讓，最後還是依他，於一九三三年以四千元的高價買到。使「陶陶」分而複合，最後都安居在北京圖書館的善本書庫裏。

以上略舉幾個例子以說明「五好」的標準，其實「五好」全備的書哪有許多，夠上三好、兩好，甚至有時突出的一好，也可使書成為善本，比如說有黃蕘圃的跋語或者汲古閣的圖章，等等。

我父親藏善本書繼承了傳統的路子，注重宋、元、明刻本，精抄本和名人手校本，但他並不受前人的囚囿，往往自辟途徑。比如說他很注重清刻書的精本，晚年更喜搜集清活字本書，

得到四百多種。其中有清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李瑤用泥活字印的《金石例四種》，這書和北京圖書館藏的翟金生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用泥活字所印書都是罕見的珍籍。刻本書中則有乾隆二十八年馮氏聚德堂刻本馮浩的《玉谿生詩集注》，初印精美，曾收入《中國版刻圖錄》。就是為平常閱讀的書他也往往非初印整齊者不收，如《津逮秘書》等。他鑒賞圖書很注重紙張，晚年尤其注意研究開化（花）紙的沿革，在他藏的康熙年間秀野草堂本《溫飛卿詩集》前曾寫一小記如下：

「開花紙之名始於明代。明初江西曾設官局造上等紙供御用。其中有小開花（較薄）、白榜紙（較厚）等名目。陸容《菽園雜記》稱：衢之常山開化人造紙為業，開花紙或以產地得名，他省沿用之。清初內府刻書用開花紙模印，雍正、乾隆兩朝尤精美。紙薄而堅，色瑩白，細膩腴潤有撫不留手之感。民間精本亦時用之。嘉道以後質漸差，流通漸稀，至於絕跡。此書是康熙印本，紙之瑩潔細潤皆遜于雍正、乾隆兩朝，非比較不能鑒別其差異。偶有所會，聊記數語於此，他日當取清內府本以證之。一九八二年叔弢記，時年九十有二。」

他在一九八四年去世之前還說過，要到天津圖書館去看開化紙的書以印證他的看法，可惜已來不及去做，只好有待後人了。

我父親對版本的興趣還表現在他大力搜求影印的善本書上。他常常說影印書精美的可說「下真跡一等」，足供賞玩。所以從清末楊守敬在日本影刻《古逸叢書》以來，整個民國時期影印的善本書他無不搜羅完備，日本影印的書也多方尋求。在他藏書中這也是一大宗，像《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庫珍本》這些常見的大部頭書不待說，自然具備。《古逸叢書》他有整套的一部，還有單行本若干種。因為這種叢書有用日本紙印的，也有用中國宣紙印的，他遇見單行本有紙張不同的就再買一部。商務印書館影印《續古逸叢書》他買了一全套。吳昌綬雙照樓影刻宋、元本詞六十一種他不但全備，而且對紙張不同的藏有複本。

民國時期董康（綬經）在上海用木版影印古書，刻印精善，他收藏了全套。新中國成立後影印的善本書他也看到就買。他舊藏的元大德廣信書院《稼軒詞》先有珂羅版影本；後來一九七四年上海書畫社又依此本並參照四印齋翻元本以木刻影印出版，他看到刻印十分精美，買了一部，並寫了一篇小序，說木版刻書是我國傳統藝術，但近代日就衰微，「今見此書秀麗精美，直欲上繼康熙時揚州詩局之遺風，不禁驚喜。」並且寫信給顧廷龍先生，詳細詢問了書手刻工等人的姓名，記在書上，以示表彰。他舊藏的北宋蜀本《王摩詰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他在自己的一部上作了題記，說見到影本「如對故人，數十年前（指得書時）光景恍然在目。國家重視文物，化身千百，嘉惠士林，可為此書慶。我一人欣然歡呼，烏足以盡之。」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他已在重病之中，聽到了宋本《金石錄》影印出版，還十分高興地問我看見了沒有，印得如何。又聽到他舊藏的宋池州刻本《山海經》也將影印出版，還說一定去買一部，可見他對善本書影本之愛好。

他對日本影印的我國善本書十分注意，因為其中多為不經見的書，而且印刷精美超過我國。他和日本的古書鋪如田中慶太郎的文求堂有來往，常通過他們買書。日本所藏的如北宋本《孝經》、《姓解》、《重廣會史》的影本他都有。正平本《論語》（四部叢刊影印的就是這一本）他先有珂羅版影本；後來有木刻影本，他又購置一部。日本前田侯爵家「尊經閣」藏有宋刻本《世說新語》（解放後我國曾縮小影印出版），影印了出來，他寫信給日本書店去買，回信說這是非賣品。他得書心切，就給前田家寫了一封信，並把自己刻印的書寄去以為交換，果然得到了一部，十分高興。他搜羅影本並不限於刻本書，日本京都大學影印的古寫本他也有全套的，其餘影印的卷子本如《文選注》、《玉篇》、《王勃集》（五色箋上寫本）等等，他也搜羅甚多。

我父親還喜歡把自己收藏的善本用珂羅版或木刻影印以廣流傳。他印過宋書棚本《魚玄機

詩》，是日本東京小林寫真製版所精印的，紙張印刷都十分講究。他又托董康刻印過所藏的宋本《寒山子詩》。還以珂羅版影印過元相台岳氏本《孝經》和宋本《宣和宮詞》。這些書都用好紙精印，《寒山子詩》曾用開化紙印過幾部，《宣和宮詞》用明朝紙印過四部，《孝經》曾用乾隆高麗紙印過，都可稱為可供賞玩的書中精品。

我父親搜集的有版本目錄學的書也很多，達到二百餘種，其中有許多「書影」最值得注意。「書影」就是把善本書各影印一兩頁，以多種彙集成書，等於一個插圖本書目，使讀者可以窺見版刻印刷的面貌，是現代目錄學的一大創造。最早清末楊守敬刻過《留真譜》就是這個意思，但是他連一頁書都不全刻，只刻幾行，雖能窺豹一斑，頗不過癮。一九二二年常熟鐵琴銅劍樓瞿家的後人瞿良士把家藏的宋本一百六種，金本四種，元本一百零六種影印成《鐵琴銅劍樓書影》一部，得此一書就等於有二百多部宋、元本書在手邊，可以隨時翻閱，既便於研究又可供玩賞。而且這部書影還印了不少書中的名人題識，更增加了閱讀的興趣。瞿氏書影之外還有些別人印過書影，但規模要小得多，而且系統性也不足。真正蔚為大觀的是新中國成立後北京圖書館編的《中國版刻圖錄》（一九六零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圖錄中共收書五百五十種，其中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刻本四百六十種，明、清活字本四十種，版畫五十種。此書編纂總負責的人是趙萬里先生（書上不署名是極左思潮的反映），所以先後考訂極精，用珂羅版印刷又十分精美，是研究版本學和愛好古書的人決不可少的參考書。如果一定要找美中不足，那就是因為拘於體例，書中沒有印抄本和名人的題記，這對於癖好古書的人，未免覺得有點遺憾了。

我父親非常喜歡搜集書影。我記得幼年時他在坐椅旁放有一部《鐵琴銅劍樓書影》，時時翻閱，有時高興了還對我講講裏面的書，我當然不懂，不過對這部書的名字和形象是印象極深的。在他九十歲生日時，北京圖書館冀淑英同志編了《自莊嚴堪善本書目》，由他親自選

定藏書中宋、元、明刻本及抄本中精品五十種印成書影，附在目前，可惜限於印刷條件，縮印太小，但也聊勝於無。這樣把書目和書影結合起來，也可說是開闢了善本書目的一種新途徑吧。

他除了國內印行的書影都搜集齊備之外，還特別注意日本所藏中國善本的書影，並收集得很多。其中有把清末藏書四大家中陸心源的藏書全部買去的岩崎氏靜嘉堂的書影，有漢學家內藤虎（湖南）博士的《恭仁山莊書影》，日本帝室圖書寮藏書的書影等，裏面多不經見的善本。例如《恭仁山莊書影》裏有宋本《通典》，字體方勁，顯然是北宋刻本，比較之下傅沅叔先生舊藏的一部《通典》（後來賣給日本東京文求堂，文求堂售書目裏面有書影）就顯得時代稍後，可能是南宋紹興翻刻本了。

自莊嚴堪的收藏中還有敦煌卷子二百五十多卷，雖然我父親自認為其中精品不多，可是在國內私人收藏中也是少見的。這些卷子中突出的有北齊天保九年寫《羯磨》，隋開皇十三年寫《禪數雜事》，隋大業四年寫《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七，隋大業九年寫《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唐開元二十年寫《大般涅槃經》，後周顯德五年寫《佛說無常經》，唐人寫《文選注》，唐人寫曲子詞殘卷（在殘經背後）等。關於在民間流傳的敦煌寫本的來源還有一段掌故。敦煌藏品經過斯坦因、伯希和劫掠之後，當時的政府聽到消息曾令甘肅當局將餘下的掃數裝運來北京（約有八千餘卷，現藏北京圖書館）。到了之後，尚未清點就被參與其事的李盛鐸（木齋）、劉廷琛、何邕威、方地山（名爾謙，別號大方）四個人打開箱子搜刮了一遍，以李氏所得為最多最佳，後來多售到日本。在國內見到敦煌的卷子大多是這批裏的東西。其中方地山是揚州名士，也是我父親的好友，這件事是我小時候聽他親口向我父親講的，所以至今記得。他的藏經後來大多售給我父親，其中《降魔變文》一種則賣給了胡適。李木齋得了敦煌卷子後，竟引起一樁偽造敦煌藏品的事，因為這件事和鑑定文物有關，所以在此要談一下。有一陳某，